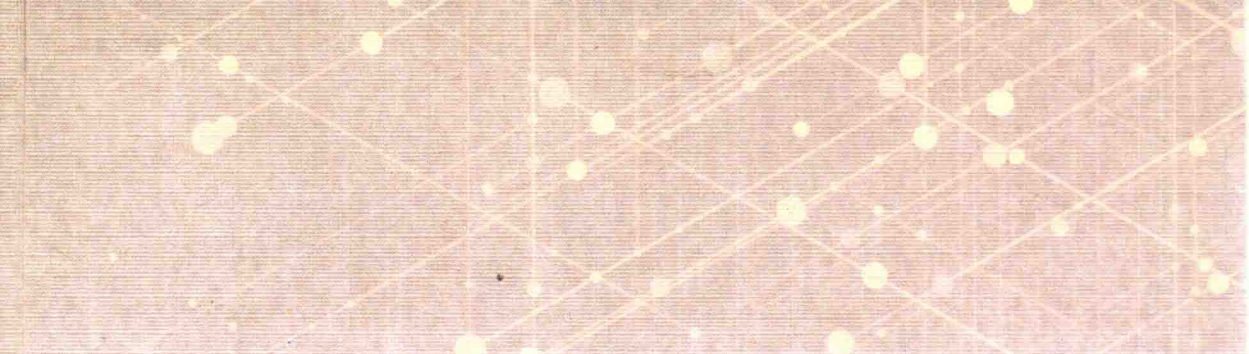




从嵌入到内生

论社会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与转变目标

杨思远 主编

非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嵌入到内生

论社会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
特点与转变目标

杨思远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嵌入到内生：论社会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
与转变目标/杨思远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8

ISBN 978 - 7 - 5161 - 8897 - 2

I. ①从… II. ①杨… III. ①民族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研
究—中国 IV. ①F12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659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戴玉龙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05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成果
(项目编号MUC2011ZDKT03)

《社会转型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编 委 会

主 任：刘永佶

副主任：张丽君 李克强

委 员：王文长 王天津 龙远蔚

张兴无 张建平 杨思远

黄健英 谢丽霜

总 序

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也是重要理论课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又是主要内容，它关系到民族团结统一以及文化、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保持了快速增长，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已有明显改变，但仍然未能在总体上摆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我国民族地区的显著特点是地域面积广阔，族群众多且分布不平衡，大多处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类型多样，文化传统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些特点使民族地区在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具有显著的特征。少数民族地区（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和能源基地，在中国的能源战略、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探索现阶段中国各民族及民族地区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融入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自主发展之路，对创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除了自然条件的多样性外，民族地区也有历史形成的文化多样性，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必须考虑经济合理性与文化适应性的关系。我们的研究不仅关注社会转型的时代大背景，而且注重社会转型、经济发展、文化保护之间内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处理好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选择。这一新选择适应新时期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要求，对现实问题有针对性，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可操作性。

《社会转型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是我主持的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重大项目”，总体包括：“新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反思”、“社会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特点与目标”、“民族地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对口支援政策的评估与创新”、“国家主体功能区政策背景下民族地区发展方式选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扶贫攻坚的类型和模式”。研究成果有调研报告、论文和著作三类。著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敬请读者批评。社会转型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有着重要影响，只有把握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才能正确理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才能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把握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特殊规律，进而丰富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研究成果。

劉永佳

2016年5月1日

写作分工

全书设计、前言、统稿 杨思远

第一章 董 宁

第二章 宋志娇

第三章 王玉芬 石 越

第四章 罗 莉

第五章 张冬梅

第六章 马 博

第七章 张德政

前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从发展方式来看经历了两个阶段：嵌入型发展阶段及其转型阶段。当前，要明确转型的目标，必须弄清嵌入型发展方式的特点，以及这种发展方式在社会转型条件下所遇到的困境。内生型发展方式的提出，不是某种脱离发展方式演变史的产物，而是嵌入型发展方式演变合乎逻辑的一个进路。

嵌入型发展方式在今天面临着转型，并不意味着它在历史上毫无价值，恰恰相反，在摆脱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关系，获得了国内各民族平等关系的前提下，新中国通过国家政权和统制经济体制推动民族地区走上嵌入型发展道路，具有巨大的、积极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第六个关系，即“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① 这一思想表明，嵌入型发展方式的本质是帮助型发展，是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真诚帮助。这种帮助是整个中华民族在政治上获得民族独立统一后，在经济上巩固独立统一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原因，到新中国成立时，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际是存在的。对于刚刚获得独立统一的中华民族来说，迅速而有效地消除这种差距，是一项极为重要和急迫的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几千年来，民族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是这种差距形成的制度基础，新制度的建立必然提出消除差距这一历史性课题。

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不仅包括领土的统一和政治文化上的独立统一，还要以独立统一的经济为巩固的基础。按照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规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划，国内各种资源的统一开发和利用，各地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各民族共同参加经济建设并共享发展成果，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的主要内涵。不可想象，这种统一经济格局的形成能够脱离既有的民族经济基础，包括实质上存在的民族间经济发展差距，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取长补短从来是谋求经济发展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先进的民族帮助落后的民族发展经济，必然采取嵌入型发展方式。

统制经济体制的最显著的特点在于“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统一在中华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建构之下。苏联援助新中国，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前者力图构建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后者旨在构建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以统制经济体制为支撑，以中央政府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要组织形式，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以东部尤其是沿海地区为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的主要来源地，以工业化目标的民族地区嵌入型发展方式得以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出于国防安全战略需要所实施的三线国防工业布局战略，使得西南和西北成为国防工业投资的重点地区，而沿海工业则在备战的考量中被大量内迁。这个战略进一步强化了嵌入型发展方式。改革开放后，东部加工业的超高速发展，出现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紧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成为制约国民发展的瓶颈，在西部大开发的新战略中，西部民族地区再次成为能源和资源投资的重点，尽管这个阶段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仍延续了嵌入型发展方式。时至今日，这一发展方式仍在发挥作用，而且由于惯性和在这一发展方式下形成的利益格局，要实现转型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障碍。

嵌入型发展方式的主体不是民族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而是国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成为帮助的对象，成为客体。嵌入的方式是国家计划。统一的国家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将人力、物力和财力按照计划项目的要求从全国各地投入到民族地区，“大会战”、“大三线”、“大内迁”、“大开发”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行为模式，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强制性和有保障，使得嵌入强而有力；财政转移支付成为许多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嵌入的项目基本采取国有企业的形式；以国防科技、电子化工、交通运输、资源开发、能源生产和农畜产品加工等工业项目为主要目标，民族地区的嵌入型工业化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工业化极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客体性、计划性、转移支付、国有性和工业化的目的性是嵌入型发展方式的几个主要特点。

在嵌入型发展方式下，民族地区短期内迅速改变了地区经济结构，农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开始向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变。许多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首次迎来工业文明，在千百年来由农民、牧民、猎民、渔民、山民等构成的少数民族劳动者群体中出现了国企工人。沉睡地下千万年的资源得到开发，偏僻落后的民族地区开通了公路、铁路和航空线，酥油灯、松油灯、煤油灯照明为电灯所取代，汽车代替了奔马和牛车，拖拉机取代了手扶犁。军工、电子、机械、化工、航天、航空、有色金属、交通、能源等国防科技工业在西部民族地区矗立起来。大草原、大戈壁、大沙漠、大高原上迎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汉族兄弟，经济、技术、文化得到空前的交流与融合。民族地区在嵌入型发展方式下取得的经济成就为千百年来所未有，不仅奠定了该地区此后一切经济进步的基础，也是新中国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嵌入型发展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主要不是依靠该地区的各民族。经济发展目标的确定，项目的选择，资金的积累，人才的供应，经济成果的分配等经济发展权，统一由国家掌控。这对于建立全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极为有利，但是，一旦这个体系建立起来，经济发展目标就开始多元化，不再以发展工业生产为直接目标，而以满足消费需要为直接目标，以改善当地各民族生活水平为直接目标，嵌入型发展方式的内在矛盾就积累起来、尖锐起来，它是东、中部地区粗放型发展方式在民族地区的延伸和表现。

嵌入型发展方式在民族地区造就了一个二元的经济结构，即嵌入的现代工业经济与当地的传统农牧业经济并存。工业，尤其是资源型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作为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同基础产业农牧业相脱节，支柱产业不能发挥支柱作用，基础产业也不能发挥基础作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恰是民族地区从外部嵌入工业文明的结果。二元结构造成工业和矿业成为民族地区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传统农牧业则出现停滞，城乡差距由此拉大。

由于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与人才匮乏，嵌入型的发展方式所嵌入的工业项目难以直接吸纳少数民族劳动者参与就业，尤其国有企业的高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财务人员更鲜有少数民族涉足，随后又

忽视对少数民族的人才培养,即便普通工人,少数民族的参与比例亦偏低。这种就业结构反映在收入分配上,一方面是外来国企职工的高收入,另一方面是从事传统农牧业的少数民族农牧民的低收入。民族地区内部城乡收入差距、民族收入差距形成,且有扩大趋势,不利于社会和谐与边疆稳定。

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不断增加,对于较为贫困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滋生出“等、靠、要”的思想,即埃德加·格雷利奇所谓的“粘蝇纸效应”,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会粘在它所到的部门。^①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增强。长期的输血式扶贫无助于民族地区造血机制的形成,举国式的对口支援未能转变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许多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收不抵支,收支缺口端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有的民族地区政府债务则越滚越大,地方债风险在日益上升。

“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统一经济体形成的最高原则,其提出和落实具有深远的意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经济建设上的具体体现。2014年9月底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国家统一是各民族的最高利益”^②,再次重申了中华民族国家建构的这一原则。不过,嵌入型发展方式将这一原则推到了极致,实际使“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与发挥民族地方积极性对立起来,而在毛泽东“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③的思想那里,二者却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由于国家在不同时期发展战略的改变,从生产力的平衡布局,到“大三线建设”,从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到“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再到“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民族地区在外部主体嵌入型发展中单纯考虑国家需要,难以形成本地区内部协调、平衡的发展格局,在时间上就很难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例如,民族地区的矿产资

^① Gramlich, E. M., Intergovernmental Grants: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in W. E. Oates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iscal Federalism*,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7. pp. 219 - 239.

^②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

^③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源开发，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迅速拉高 GDP，而一旦资源告罄，这一地区原来作为经济增长点的资源产业，就会变成经济萎缩点。在没有接续产业的前提下，为维持增长，只能将投资重点转移到房地产炒作等虚拟经济领域，产生了不少“鬼城”。

我们已经指出，嵌入型发展方式具有客体性、计划性、转移支付、国有性和工业化的目的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实际是统制经济体制下，以农业社会为起点，在较为封闭的特定社会环境中展开工业化建设所形成的。随着社会转型，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交织并进，相对静止的社会经济开始躁动起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统制经济体制，封闭的社会经济日益转变成向全球开放的经济体。与此同时，民族地区的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本地区的发展成为目标本身，单纯依靠外部力量的嵌入型发展，已经不能适应社会转型条件下经济发展的需要。探求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目标，除了要把握嵌入型发展方式内在矛盾的运动趋势，还必须与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条件相契合。

内生型发展方式是嵌入型发展方式内在矛盾的解决。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一时期可以主要依赖外援，但是长期、协调、可持续的增长却不可能依赖嵌入型发展来达到。确立以民族地区各民族为主体，以国家嵌入的援助为条件，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和区情特点，走内生型发展道路，是民族地区发展方式转型的根本目标。这个目标的提出也是当前社会转型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市场化要求以经济主体权利的清晰界定为前提，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生产目标，以获取商品价值为经济动因，在各种市场主体竞争中从事经济活动，主体独立承担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市场化的这些要求体现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就是走内生型发展道路。嵌入型发展把主体关系颠倒了，计划执行者缺乏自主安排生产、投资的权利和主动性，“等、靠、要”的观念也不能适应市场竞争需要，一切由政府包下来的统制经济体制使得民族地区各经济主体不能承担市场风险。嵌入型发展方式不适应市场化的要求是多方面的。

工业化初期，嵌入型发展有利于举全国之力迅速建立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一旦这个体系形成，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即整个工业体系升级

有赖于在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从事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①，而创新是不可能由外部援助去完成的，只能由民族地区各民族自主完成。统制经济体制下，依靠国家计划只能生产既有产品，无法对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创新产品和产业进行计划。工业的进步依靠产品和工艺创新，创新排斥计划，创新需要经济主体敏锐把握工业发展趋势，准确捕捉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而嵌入型发展方式无疑与创新绝缘。工业在本质上“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②，民族地区工业化这本书，不可能依靠外部主体来打开，走内生型发展道路是唯一选择。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城市的聚集功能和辐射功能的发挥，以城市自身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民族地区的城市在嵌入型发展方式下，与广大农牧区的发展相脱节，一方面削弱了民族地区城市的聚集功能和辐射功能，另一方面也使城市自身难以获得综合性的经济实力。于是，诸如石油城、煤炭城、钢铁城、稀土城、铝都、锡都、砷都、铬都、铅都在民族地区频现。城市产业结构单一，不能有效发挥出城市的综合功能。城市与腹地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借助嵌入型发展方式达到，因为这种发展方式的存在以城市与腹地之间的脱节为前提。内生型发展方式能够使城市化成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凡属聚集功能和辐射功能薄弱的集镇都难以发展为城市，而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恰恰在聚集和辐射功能的有效发挥中实现。

经济全球化赋予各民族各地区在世界市场中一种特定的分工角色，竞争的范围扩展到了国际社会。这种角色分工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嵌入型发展方式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因为现实存在的计划都是以主权国家的政府为主体制定和实施的，也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不存在一个全球计划，因而，根本不可能调整各地区不断变化的分工角色。全球化要求民族地区各民族成为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在变动不居的世界市场上，主动去捕捉商机，把握行情，形成优势，调整结构，提升竞争力。对于民族地区来说，全球化就是要走本地区内生型发展道路。

① 杨思远：《研发资本》第一卷，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走内生型发展道路首要的问题是制定民族地区自身发展的目标和规划,这个规划以该地区各民族利益为动力,以各民族的需要为目标,离开自身的发展目标,离开各民族利益的谋求,内生型发展就是空话。在目标确定上,民族地区内生型发展并不与国家整体需要相对立,而是在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全国性战略规划之下,谋求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因为,整个中华民族同样是在走独立自主的内生型发展道路,每个地区是全国内生型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协调好全国与地方发展目标,就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的过程。

民族地区的区情特殊,在谋划内生型发展时,要紧密结合这一区情。特殊的自然条件,特殊的民族,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特殊的经济生活,特殊的政治制度,特殊的语言环境,特殊的社会风俗,特殊的经济文化交往方式和交往渠道,是特殊区情的主要方面。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既定生产力是谋求经济发展的基础,要从这个基础出发去规划产业、布局生产力、调整城镇结构,走出民族地区富有特色的内生型发展道路。

民族地区内生型发展不是排斥外援,而要以国家嵌入的援助为内生型发展的条件。内生能力是发展的根据,嵌入援助是发展的条件,外援通过内生发挥作用。外援作用的发挥恰恰以增强内生能力为中介,它使外援的作用更有针对性、更为有效,也更为持久。根据内生发展的需要,不同时期会提出对外援的不同要求,在这种以内生为主,外援为辅的交互作用中,才能实现民族地区经济从外部输血式发展向内部造血式发展的转变。

我们这里所提出和论证的民族地区内生型发展道路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有根本区别。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典与现代两个阶段。古典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斯密、李嘉图、穆勒、马歇尔、杨格、熊彼特等,他们重点从比较优势、资本积累、企业、分工、创新等视角研究经济增长的动力及其限制作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有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索洛余值理论、全要素生产模型以及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认为,一国产出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由此,哈罗德与多马提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和提高资本产出转换率。索洛和丹尼斯在研究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实绩时,发现依靠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只能解释部分经济增长,相当程度的

经济增长是除去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因素之和,即广义技术进步所获得,这就是索洛余值理论。本哈拜伯和斯皮吉尔用全要素生产模型,对不同国家资本和人力资本同经济增长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一国人力资本存量决定一国全要素生产率。罗默和卢卡斯等人,研究了科学进步、教育水平和市场制度等因素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中的知识累积效应,证明科学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边际收益递增效应,一改古典经济学有关传统的生产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结论。

民族地区内生型发展道路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区别在于:(1)对“内”的理解不同。内生型发展道路理论中所说的“内”,是指民族地区之“内”,是与区外相对应的概念;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说的“内”,是指经济之“内”,与非经济的政治、文化相对应。(2)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体理解不同。内生型发展道路理论把经济发展的主体视为人,在民族地区就是各民族的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把各种资本、劳动力、技术、全要素等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3)对“生”的理解不同。内生型发展道路理论认为,只有人的劳动具有生产性,人在劳动基础上的生产、生活和生态,构成人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发展只不过是要素的产出效应,物具有“生产”性。(4)对“发展”和“增长”的理解不同。内生型发展道路理论所说的“发展”目标是人的发展,即各民族劳动能力的提高;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说的“增长”,是一国产出,即财富的增长。

在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上,已有成果主要概括在粗放型和集约型发展方式两个概念中,集约型发展方式又被称为“科学发展方式”。民族地区因其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特定地位而表现出的嵌入型和内生型发展方式,不过是粗放型和集约型发展方式的延伸和表象,因此,提出和论证内生型发展道路理论,不仅是发展方式全面转型的需要,在理论上也是对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理论的一个具体化。

本书为刘永佶主持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社会转型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研究”(项目编号:MUC2011ZDK T03)的子项目“社会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与转变目标研究”的最终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嵌入型经济发展方式	1
一 民族地区嵌入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与主要特点	1
二 民族地区嵌入型经济发展方式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12
三 民族地区嵌入型经济发展方式所取得的成就	15
四 民族地区嵌入型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不足	23
第二章 民族地区内生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标的确定	43
一 内生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特点	43
二 内生型经济发展方式目标确定的原则和依据	51
三 内生型经济发展方式目标确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61
第三章 市场化与民族地区内生型发展方式	70
一 市场化对民族地区发展方式转型目标的要求	71
二 民族地区嵌入型发展方式不适应市场化	79
三 民族地区内生型的市场化发展方式	102
四 内生型的市场化发展方式形成的路径	115
第四章 工业化与民族地区内生型发展方式	127
一 民族地区工业化形成背景与进程	127
二 民族地区嵌入型工业化的特点	133
三 民族地区嵌入型发展方式对工业化的制约	144
四 民族地区内生型工业化道路	160